

赓续商都文脉 谱写文保新章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条例》解析

马玉鹏 程一帆 赵静云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作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古今叠压型大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载体，承载着3600年早商文明的厚重底蕴。遗址位于城市核心区，遗址保护、城市建设与民生发展相互交织，统筹三者协同推进是遗址治理的关键课题。

2026年3月1日，随着《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遗址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法治化、精细化的全新阶段。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工作实现了从偶然发现、被动抢救到系统管护、规划统筹，再到法治赋能、全域共治的历史性跨越。

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面临的困境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地处城市核心区，遗存与城市空间深度叠压，保护工作长期面临城市发展冲击、治理主体多元的复杂局面。《条例》出台前，受多重因素影响，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遗址保护提质升级的核心瓶颈。

权责边界模糊，协同效能不高

遗址保护涉及多行政区、多职能部门及多元产权主体，长期存在权责边界不清、协同机制不畅的问题，制约保护效能提升。一是权责划分不精细，保护管理机构、属地文物部门与各产权主体间的职责缺乏法律界定，事权笼统、责任虚化，权责交叉易形成监管盲区，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二是职权缺乏法定支撑，保护管理机构职责仅靠行政文件明确，无法律刚性保障，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权威性不足，多依赖临时沟通、个案协调，难以形成常态化协同机制。

制度体系不完善，管控机制不健全

此前，遗址保护的最高制度依据为市级政府规章，法律位阶与国家级文保单位的价值地位不对等，制度体系不完善，难以适应现实保护需求。一是制度接续不畅，管控要求呈碎片化。2020年，原有市级保护规定到期后，管控要求分散于各类通知、专项规划之中，对郑州商代都城遗址的保护在法律层面上存在空白。二是保护边界动态调整机制缺失，现有保护范围静态固化，未建立与考古新发现联动调整的法定机制。近年来部分重要考古新发现未能及时纳入法定保护范围，管控层面存在制度缺口。三是文物移交机制不完善，出土文物移交缺乏规范的制度流程，发掘单位文物移交工作滞后，直接制约展示利用效能提升。

管护支撑能力薄弱，精细化水平有待提升

原有保护模式以人工巡查、本体修缮为主，整体呈现“重本体轻环境、重事后轻事前”的特征，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难以适配大遗址保护的高要求。一是保护要素制度覆盖不全。现有规定侧重城墙、宫阙区等可见本体遗存，对遗址周边历史风貌、自然生态保护缺乏刚性约束。二是技术应用缺乏制度支撑。智慧监测、病害预警等现代化保护手段的推广与升级未纳入制度规范，本体风化、环境侵蚀等隐患难以及时预警处置，事前防控机制缺失。

价值转化不充分，多元共治基础薄弱

长期以来遗址保护重管控、轻赋能，制度统筹引导缺位，文化价值与综合效益释放不充分，社会协同保护基础薄弱。一是展示阐释深度不足。展陈以静态形式为主，科技化、沉浸式

体验应用偏少，文化内涵阐释不系统，公众认知度与获得感不强。二是价值转化机制不畅。文旅融合缺乏制度统筹，遗址保护与城市更新、产业发展衔接不紧，特色业态培育滞后，文创开发、文化传播较为零散；考古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考古发现多停留在学术层面，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条例》解析

《条例》共33条，聚焦遗址保护管理、展示利用、法律责任等核心内容，对遗址保护与展示工作进行系统性重构，直击多年来的实践堵点，以地方性法规的制度刚性，为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共生发展构建了法治化治理新范式。

厘清权责体系，破解协同困局

《条例》聚焦遗址保护治理中长期存在的权责边界模糊、多部门协同不畅、“九龙治水”效能不高突出问题，从法定确权、机制协同、监督问责三个维度系统施策，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保护治理体系。《条例》明晰了遗址保护权责分工，明确市人民政府负总体领导责任，市文物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属地人民政府承担协同管理义务，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落实日常管理主体责任，同时划定了发展改革、公安、财政等相关部门的履职边界，从根源上消除推诿扯皮的制度空间。构建“市级统筹+属地协同+专门机构管理”的协同管理架构，将跨部门协调机制上升为法律规范，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从“人情协调”式的个案沟通向“制度协同”转变，促进保护工作从单一部门主导向多主体共治升级。同时，建立健全社会投诉举报处置制度和刚性追责问责机制，通过社会监督倒逼责任落实，以严格问责保障权责对等，确保各项保护职责与协同要求落地见效，全面提升遗址保护治理效能。

提升法治层级，补齐制度短板

《条例》着力提升遗址保护法律效力层级，紧扣保护过程关键环节，针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管理、遗址本体保护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逐一明确制度规范，系统性补齐以往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制度短板。在效力层级上，从政府规章跃升为地方性法规，制度刚性与权威性显著提升，真正适配郑州商代都城遗址的文化价值与保护地位。针对遗址保护全过程，《条例》落实上位法有关考古发掘审批规定，结合遗址保护实际进一步细化，明确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在依法履行报批手续的同时还应当告知市文物行政部门，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开展相关作业。压实出土文物管理全链条责任，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对考古出土文物登记造册、妥善保管以及移交义务，同时规定郑州商代都城博物院等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按规定收藏、展示出土文物，将考古发掘、文物移交、收藏展示全流程纳入法定规范，确保出土文物有序归集、完整呈现。完善遗址本体保护制度体系，明确各类禁止行为；依法划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分级管控建设活动，分类处置破坏遗址风貌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有效化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优化运维体系，提升管护质效

针对遗址保护日常工作中基层管护覆盖

不足、管理方式粗放，以及安全运维风险防范不系统等问题，《条例》构建全链条管理体系，推动遗址保护运维提质增效。《条例》健全日常管护机制，确立遗址保护管理机构为日常管护责任主体，细化监测维护、巡查防控、制度建设等十项具体职责，实现日常保护、管理、利用事项全覆盖；构建市、区、街道三级管护责任链条，压实属地及街道保护职责。完善安全运维体系，建立安全保护机制，配齐安防、消防设施设备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规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明确应急响应与分级报告要求，确保险情快速处置、闭环管理。突出科技赋能支撑，将智慧化监测等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纳入法定义务，推动管护模式从传统人防向“人防+技防”转变，推动保护关口前移，降低病害处置成本与遗址本体损害风险。规范开放管理，以法规形式明确游客承载力核定、流量管控、游览线路设置等要求，建立健全安全保障与应急处置制度，平衡好遗址安全与公众参观需求，让遗址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有序开放。

深挖价值内涵，激活文化动能

围绕遗址价值阐释深度不足、文化传播辐射力不够、文物资源活化利用不充分、社会参与程度有限等问题，《条例》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构建起“保护优先、深化阐释、活化赋能、多元参与”的保护展示路径，着力推动商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内涵阐释上，明确依托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等资源载体，深挖遗址历史文化内涵，创建郑州商都文化品牌；强化化学术研究支撑，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and 专家学者开展研学、讲座等公众教育活动，增进公众对遗址的了解；对外通过学术论坛、陈列展览等形式深化国际合作，促进商文化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在价值转化上，从制度层面明确文旅融合发展方向，支持遗址资源与城市更新、特色业态培育相结合，推动考古成果向公共文化作品、文创产品转化，打通从学术研究到大众传播的转化路径，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向赋能。在文化资源整合上，以“商城中轴线”研究为牵引，统筹郑州商代都城遗址、郑州文庙、郑州城隍庙等文化资源，构建完整连贯的城市历史叙事体系，推动郑州商都历史文化片区向“遗址公园+博物院+历史街区”一体化全景式文旅展示中心升级，着力打造中华文明展示地、城市发展历程展示地、商都商业南城融合展示地。

《条例》的施行，标志着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展示工作步入法治化新阶段。《条例》以制度刚性厘清保护与发展边界，既筑牢文物安全底线，也为城市更新留出空间，探索出大遗址与现代城市共生共融的实践路径。以法治护航文脉传承，以共识凝聚保护合力，千年商都的历史底蕴必将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底气，让中华文明根脉在新时代薪火永续。

（作者单位：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

边界未消 城迹可辨

——安徽三座老县城空间辨识实践

李佳蓓

随着我国各地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空间结构正在持续发生变化。不少老城中原有的城垣、城门、护城河等具有明确边界意义的遗存，或因拆除、覆盖而难以辨识，或仅以局部遗迹、地名、水系等形式留存在现代城市之中。尤其是对传统县城而言，历史信息往往早已融入现代城市环境。因此，如何在缺少完整地表遗存的情况下重新认识老城的空间格局，成为老城保护与遗产调查中亟待回应的议题。

笔者以安徽省庐江县城、古皖城（今潜山市）、无为县城为例，结合文献资料与现场调查，初步探讨如何通过多源资料相互印证，发现隐藏在现代城市中的老城痕迹。

多源互证：老城边界辨识方法

老城边界辨识，需要认识不同资料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类型及局限性。地方志中的城池图与文字记载，是追溯老城结构的基础性资料；制图重心在于标示城内城门、坛庙、衙署、桥梁等重要建置的名目及其相对方位，并不追求城垣轮廓、街巷尺度与实际地理形态的严格吻合。因此，地方志舆图更适合作为城内多个建筑大致方位判断的线索。

相较于传统舆图，近现代地图中的道路、水系、街区关系及城垣轮廓更贴近实际地理环境，绘制比例更精准，便于建立古今空间的对应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卫星影像为观察城市变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视角。这些历史影像清晰地记录了城市大规模扩张之前的空间状态，部分已被现代建设拆除或覆盖的城墙、水系和道路痕迹等，仍可从影像中辨识。据此，通过不同时期的影像对比，能够观察历史空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延续与变化。

但仅靠文献资料还是难以了解老城的真实空间关系，必须结合实地踏查，才能将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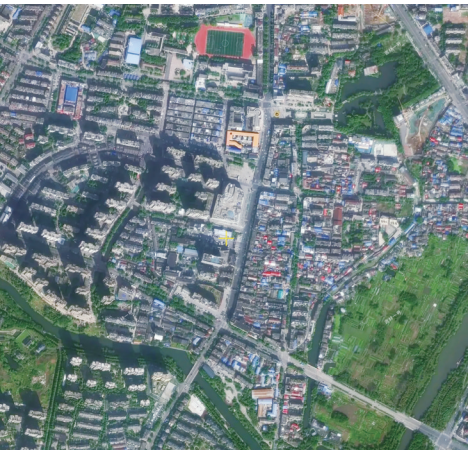


图1 庐江县城 2025年卫星影像（图片来源：吉林一号卫星影像）



图2 庐江县城 1945年地图（图片来源：庐江县博物馆）

信息与现状空间准确对应。其中，道路走向、水系位置、地形变化及居民口述记忆等，都可能成为认识历史空间的重要线索。

据此，通过文献、地图、影像与现场资料之间的反复校验，才能逐步建立对老城格局的认知。这种辨识过程并非复原某一时期的城市原

貌，而是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寻找仍然延续的老城空间关系及其难得的遗迹（存）等，为后续遗产价值认定与保护措施制定提供参考。

老县城案例要挈

庐江县城：水系与桥梁中的边界探索

如今的庐江县城，已无法通过卫星影像直接辨认城垣与护城河的位置（图1）。但清康熙三十七年、雍正十年、嘉庆八年、光绪十一年《庐江县志》记载的城图及文字，为追溯古城结构保留了重要线索。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知不同时期城门名称虽有所变化，但可以明确六处城门，分别为小北门、大北门、东门、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各城门外均设吊桥。县志城图虽难以精确呈现城垣走向，但城门、桥梁与护城河的空间关系等仍可作为定位依据。

在老城东门区域实地调查中，清光绪十一年《庐江县志》所载“临仙桥又名捧檄桥，位于东门外侧”的记述得到了验证——捧檄桥仍保存于原位置。该桥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经与当地文保部门工作人员确认，桥体虽经过加固，但位置未发生改变。

以捧檄桥为参照，进一步寻找老城中的遗迹。通过比对1964年卫星影像，发现东门小桥外侧仍保留与旧城相关的水系痕迹，其走向与地方志所记载的东侧河道关系基本对应。据此判断，东门小桥位置与历史上的通道桥可能存在延续关系，为进一步推断东侧护城河范围提供了参照。

除城门与桥梁外，道路延续也为寻找古城边界提供了线索。1964年卫星影像图显示，城区内部南北向、东西向道路格局与今天牌楼中路、文昌路基本一致。结合1945年城区地图（图2），可以发现牌楼中路对应现在的南大街，并向南连接南门；文昌路对应文昌街，向西延伸至大西门。

（下转6版）



古建筑调研



中老师生讨论壁画修缮



中老师生共同进行数字化测绘

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同年。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一场以青年为主体、以世界文化遗产为现场的跨国联合实践正在湄公河畔展开。近期，由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联合老挝苏发努冯大学建筑学院、琅勃拉邦传统美术学院共同举办的“文化遗产保护赋能古城振兴”中老大学生暑期工作营在世界文化遗产地琅勃拉邦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得到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社会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沪促会）、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的大力指导与支持，6名专业教师、15名青年学生组成的跨国团队在两周的时间里深入古城街巷，系统开展古建筑勘察、数字化测绘、传统工艺调研与工匠访谈，用青春脚步丈量千年遗产，用专业技能守护人类共同财富。

深入现场：古建筑勘察与壁画记录夯实保护基础

琅勃拉邦是老挝著名古都，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古城坐落于湄公河与南康河交汇的半岛之上，历史环境完好，保存了众多以重檐坡面为特征的老挝传统寺庙建筑、法式殖民风格建筑以及二者融合的独特城市风貌，寺内壁画、金箔装饰精美，拥有木雕、桑皮纸、纺织等丰富的传统手工艺资源。作为中老铁路的重要节点城市，琅勃拉邦因铁路贯通山海而注入文旅发展新动能，游客量持续增长，也面临着文旅开发与遗产保护的时代之问。

工作营抵达伊始，便将前期调研与古建筑勘察作为全部工作的基石。团队划分多支小组，以香通寺、西普塔巴提帕拉寺等核心宗教建筑为重点，开展建筑形制勘察、结构状况记录与装饰纹样测绘。团队还重点关注了琅勃拉邦的古寺壁画。琅勃拉邦古寺内壁画题材丰富，涵盖佛教故事与民俗场景，是研究老挝宗教和传统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但目前很多寺庙壁画残损，亟待保护修缮。师生们采用高分辨率摄影对壁画进行系统采集，对壁画保存状况进行观察记录。中老学生混合编组，中方学生负责规范记录，老挝教师及僧人凭借对本土宗教文化的熟悉提供文化解读，双方协作形成了壁画勘察记录，为后续保护研究积累了基础资料。

数字赋能：联合测绘与多维留存建立遗产档案

工作营高度重视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在上海沪促会大力支持下，中外师生联合上海爱为青年公益中心（爱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坊），组织中老学生共同开展多维度的数字化采集与记录工作。

在古城整体层面，团队运用无人机进行航拍，记录琅勃拉邦古城的空间格局与肌理特征，从湄公河与南康河交汇的半岛地形到古寺与民居错落的街巷网络，获取了高分辨率航拍影像，为研究城市空间演变提供了宏观视角的基础数据。在建筑单体层面，师生们运用手持三维扫描仪对重点寺庙建筑装饰进行扫描建模，记录主要构件信息。中老学生轮流操作设备、互相配合，在协作中掌握了数字化采集的工作方法，扫描数据经处理后可生成建筑三维模型，为形制研究与保护监测提供数字支撑。

与此同时，团队还运用专业相机对建筑装饰、雕刻纹样、壁画细部进行摄影记录，对传统工艺实操过程进行影像拍摄，对资深工匠口述传承进行音频录制。航拍影像、三维模型、摄影图片、工艺视频、口述音频等多类型、多尺度的数字化资料汇聚在一起，初步构建起琅勃拉邦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为澜湄区域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跨国联合研究积累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与实践经验。

匠心传承：工艺调研与工匠访谈深化文明互鉴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关乎物质遗存，更关乎活态传承。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老挝的传统技艺也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双重挑战。工作营将传统工艺调研与工匠访谈作为深化对老挝文化理解、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途径。老挝合作方邀请美术学院的老师讲授老挝传统纹样，加深学生对老挝传统装饰文化的理解。师生们的访谈对象涵盖三个层面：一是琅勃拉邦手工坊中的资深民间手艺人，二是琅勃拉邦传统工艺美术学院的

教师——他们本身也是传统工艺的传承者与实践者，三是古寺住持——不少宗教人士本身也是壁画、金箔装饰等传统技艺的守护者。团队以一对一口述史访谈的形式，系统记录传统工艺的工艺流程、材料配方、工具使用、传承谱系与民俗寓意。在琅勃拉邦传统工艺美术学院，同学们观察学习了地道的老挝木雕、绘画等各种传统技艺；在桑皮纸作坊，师生们体验了从树皮浸泡、蒸煮、打浆到抄纸、晾晒的古法造纸全过程；在纺织工坊，同学们记录传统织物的纹样设计与织造技艺。

访谈过程中，中老学生共同担任记录者与提问者，老挝学生负责语言翻译与文化沟通，中方学生从工艺记录与保护研究的专业角度提出问题。受访人表示，传统技艺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愿意把知道的手艺都讲出来。在调研记录的同时，中方师生也主动向老挝匠人学习传统工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老挝传统工艺的独独特魅力与匠人精神。团队系统梳理了木雕、桑皮纸、绘画等老挝传统技艺的工艺流程与传承脉络，为老挝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积累了珍贵的口述史料。

田野调研间隙，项目组设置“一带一路”主题研学行程，组织师生实地走访中老铁路琅勃拉邦站、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中国援建听松村，直观了解中老铁路线路规划充分避让世界遗产的设计思路，见证共建“一带一路”惠民实效，深化对中山山水相连、民心相通的认识。

成果转化：联合创作与成果展示彰显青年担当

依托前期田野调研采集的一手素材，中老两国青年协同开展文化创意转化实践，创作分为“老挝传统工艺现代化转化”与“古城建筑遗产当代艺术再表达”两大板块，兼顾数字创意与实体手工两条路径，最终产出一批兼具文化内涵、审美价值与落地潜力的文旅原创作品。

7月24日，工作营闭幕式暨成果汇报展在琅勃拉邦遗产中心百年传统建筑群落中举办。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张社平出席并在致辞中表示，此次联合工作营利用中国文创的成功经验，助力琅勃拉邦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为琅勃拉邦传统工艺的传承发展以及旅游经济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希望中老高校继续深化文化领域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同学们依次汇报调研过程与设计方案，活动尾声，全体参与师生获得结业证书。

琅勃拉邦省文化旅游厅表示，后续计划组织辖区各村负责人观摩学习本次工作营成果，将本次实践模式作为老挝乡村振兴、本土传统技艺复兴的参考范例。

未来展望：为中老文物保护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为期14天的工作营虽已落幕，但它所开启的合作与探索才刚刚起步。本次工作营初步探索了“中方数字化技术+老挝本土文化资源”的协同实践路径，内容涉及理论研究、数字建档、活态工艺传承、文旅产业转化等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工作营在中老青年心中种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种子。中方学生在境外实践中掌握遗产测绘、数字化采集、跨文化调研的基本方法，老挝师生双方了解了中国的遗产保护理念与数字化技术，也在协作中建立的专业互信与个人情谊，为未来进一步深化中老文物保护合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与情感纽带。

从古建筑勘察到壁画记录，从无人机航拍到三维扫描，从工匠访谈到工艺学习，这场跨越山海的联合实践，是中国高校立足建筑遗产保护等专业特色，依托世界文化遗产推动澜湄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次有益探索。展望未来，中老双方将以此此次工作营为新起点，携手深耕澜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持续推进古建筑勘察、数字化建档、传统工艺传承与古建保护研究及修缮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提升联合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与水平。

（供稿：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建筑遗产修复与传承中心）

携手守护世界遗产 共谱中老友谊新篇

——中老大学生联合开展琅勃拉邦古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营纪实